

西汉鲁学系统的四言诗

李炳海

从总体上看,四言诗在西汉时期呈现出衰微的趋势,中国大陆几部重要的文学史对它大多是略而不论。可是,如果从数量方面进行考察,传世的西汉四言诗的数量,超过同期其他各类诗体作品的总和,因此,应该给予必要的关注。

传世的西汉四言诗,主要来自两个系统:一是朝廷庙堂之乐所用的歌词;二是经学系统,即经师创作的四言诗。西汉的《安世房中歌》共十九章,其中有十三章是四言诗。《郊祀歌》共十九章,其中八章是四言诗。而经师所作的四言诗,主要出自鲁学系统。鲁学之名见于《汉书·儒林传》,指的是由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。西汉鲁学系统的四言诗,主要有三个分支:一是鲁诗传人的四言诗,二是与孟氏《易》密切相关的四言诗,三是孔氏家学的四言诗。



明代陈洪绘《歌诗图》 资料图片

鲁诗传人的四言诗,主要出自韦氏家族。《汉书·韦贤传》记载:“韦贤字长孺,鲁国邹人也。其先韦孟,家本彭城,为楚元王傅,傅子夷王及孙王戊。戊荒淫不遵道,孟作诗讽谏。后遂去位,徙家于邹,又作一篇。”《汉书》本传所收录的《谏诗》九十八句,《在邹诗》五十二句,均为四言,是两首四言长诗。《汉书·韦贤传》还记载,韦贤是韦孟的第五世孙,“笃志于学,兼通《礼》《尚书》,以《诗》教授,号称邹鲁大儒”。韦氏家学是《诗经》,那么,这种家学从何而来呢?《汉书》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。

韦孟曾在楚元王刘交在世时担任楚国的傅,而这个阶段正是鲁诗的生成期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记载:“元王既至楚,以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为中大夫……元王好《诗》,诸子皆读《诗》,申公始为《诗》传,号鲁诗。元王亦次之《诗》传,号曰《元王诗》,世或有之。”文中提到的申公,指鲁人申培,是鲁诗学派的开山鼻祖,他的鲁诗著作,是在楚国供职期间开始撰写的,而韦孟也正是在此阶段居留楚国任傅,与申公是同事。韦孟是在楚王戊期间离开楚地,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,申培也是戊王在位期间离开那里。楚

明清滇人宗法唐诗

多洛肯

清代姚永概《范肯堂墓志铭》云:“诗体至唐而大备,世之论者,每称李白、杜甫,二家途辙不同,其忧时嫉俗之情则一。厥后如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,元好问之为诗犹白、甫也。”可见,唐诗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极大。从宋代开始诗歌的发展就面临着唐诗范式的选择,直至后世人把唐诗作为一种“典范”自觉学习。严羽就提出过诗宗盛唐的主张,金代以赵秉文为领袖的学古派也强调学诗要“以唐人旨为归”,元明时期甚至形成了举世宗唐和“诗必盛唐”的文化现象,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。

云南地处西南边陲,山川秀丽,人杰地灵,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。云南作为省一级的行政区划名称从13世纪中叶一直延续至今。明清时期中原移民大规模移入云南地区,进一步促进了中原的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教育等与土著原生文化的交流、融合。因此,儒家文化在云南地区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,明清时期涌现出杨黼、李元阳、谷应蛟、赵炳龙、李根元、师范、赵藩等众多土著诗人,同时还出现了赵州龚氏、太和赵氏等父子、夫妇、兄弟一门都有佳作绘世的盛况。无论是当地的土官、土司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需要,还是“改土归流”的文化影响,都促使土著文人攻读汉文、习习汉文诗词。

云南土著诗人宗法唐诗,在当时就已受到关注。南园老人张志淳评点土著诗人木公的诗,“尽有

秋》,授后苍、疏广。世所传《后氏礼》《疏氏春秋》,皆出孟卿。孟卿以《礼经》多,《春秋》烦杂,乃使喜从田王孙受《易》。”孟喜出身于经学家家庭,他所创立的《易》学流派称为孟氏《易》。学界存在分歧的地方在于孟氏《易》是否属于鲁学?或称“孟氏是和齐学一党”(《蒙文通《经学抉原》》),这是把孟氏《易》划入齐学系列,因此,有必要加以辨析。

孟喜之父号为孟卿,以研治《礼》著称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:“汉兴,鲁高堂生传《士礼》十七篇。迄孝宣世,后仓最明。戴德、戴圣、庆普皆其弟子,三家位于学官。”两汉《礼》学的创始者是鲁人高堂生,孟卿传承《礼》学,是鲁学传人,并且培养出后苍这样的高足。汉代经学恪守家法,孟喜出身于这样的家庭,他应属于鲁学成员。孟喜是东海兰陵人,兰陵位于今山东枣庄与郯城之间,春秋时期属于鲁国的势力范围,西汉时期是鲁文化区的组成部分。就所处地域而言,孟喜也属于鲁学覆盖区的成员。

传世的西汉四言诗,焦延寿的《焦氏易林》篇幅最大。他把《周易》的每一卦演为六十四卦,共计4096卦。各卦的林辞绝大多数是标准的四言诗,只有少数例外。国内学界已经陆续推出从诗学角度研究《焦氏易林》的著述,它确实是西汉四言诗重要的组成部分。《焦氏易林》是否能够纳入鲁学系列,这涉及焦延寿与孟喜之间是否存在学术交往的问题。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:“京房受《易》梁人焦延寿,延寿云从孟喜问《易》。会喜死,房以为延寿《易》即孟氏学,翟牧、白生不肯,皆曰非也。”京房是焦延寿的弟子,焦延寿自己说过曾经向孟喜问《易》,京房则认为焦氏《易》即孟氏《易》,焦延寿与孟喜存在学术交往的证据是比较充分的。至于翟牧、白生作为孟喜的弟子对此予以否认,那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在《易》学传承谱系中的正统地位而已,不能据以为实。有的学者已经把孟氏《易》与焦氏

《易》加以对比,指出焦氏《易》“是顺承孟喜而来的发展”(《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》),并且推测焦延寿与孟喜直接交往的可能性:“焦氏在梁王共(共)其资用,令极意学”的情形的下,则他游学长安时有向孟喜问《易》的机会。”(《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》)

《汉书·京房传》记载:“京房字君明,东郡顿丘人也。治《易》,事梁人焦延寿。延寿字贛,赣贫贱,以好学得幸梁王,王共其资用,令极意学。既成,为郡史,察补小黄令。”焦延寿是梁人,最终卒于小黄。上述叙述没有焦延寿前往长安求学的记载,因此,他与孟喜的交往,在梁地的可能性居多。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,梁人丁宽作《易说》三万言,“宽授同郡田王孙。王孙授施雠、孟喜、梁丘贺”。孟喜等三人出自田王孙门下,其中对施雠有如下记载:“施雠字长卿,沛人也。沛与邳相近,雠为童子,从田王孙受《易》。后徙长陵,田王孙为博士,复从卒业。”田王孙最初是在他的家乡梁国碭县(今安徽碭山西南)教授生徒,施雠是沛(今安徽淮北西)人,与碭地相距甚近,因此投到田王孙门下。孟喜是东海兰陵(今山东郯城与枣庄之间,距离碭地也不过三百里)人,孟喜之父孟卿指派儿子“从田王孙受《易》”,也应该是田王孙在碭地招收生徒期间。焦延寿最初是在梁王那里寄居治《易》,梁都睢阳(今河南商丘),那里距离碭地不足二百里。孟喜在碭地田王孙门下求学期间,焦延寿存在与他交往的可能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,田王孙卒于长安,“时喜临东海”,孟喜是在田王孙逝世前不久返回东海兰陵老家。从长安返回兰陵,通常是从长安出发东行,途经洛阳、郑州、开封。焦延寿后半生任小黄令,并且在那里去世。小黄,在今河南开封,是孟喜东归的必经之路,他与焦延寿在这里进行交往的可能性更大。此时的孟喜已经学业有成,在《易》学方面造诣颇深,因此,焦延寿对他以师相待,承认自己与孟喜的师徒关系。基于上

熟而精良。格律、字数、句数、用韵等方面都有了严格的限制,全然没有了古体诗的“自由”。而这种“不自由”正好成全了诗歌的韵律美感,为后人所标榜。以土著诗人赵廷玉板城地域特色的诗歌《望夫云》为例:“一缕浮云几度秋,坚心常在海中沓。踉跄浪打蛟龙窟,绰绰神明月楼。卷地难平千古恨,回峰又锁百重忧。可怜夫婿无情思,空报情根护石头。”这就是首广义上的律诗。首联和颔联,其基本的平仄规律是:平仄平平仄仄平,平平仄仄仄平平。仄仄仄仄仄平平,仄平平仄仄仄平。乍看来,并不符合格律诗的规则,但诗歌讲究的是抑扬顿挫的声调之美,这首诗歌很巧妙地做到了逢双必反的节奏规律,即第四字的平仄和第二字相反,第六字又与第四字相反,如此反复就形成了节奏感。逢单却可反可不反,这是因为重音落在双数音节上,单数音节相对而言就显得不重要了,这就是格律中的“一三五不论,二四六分明”规律。纵观全诗,可知押的是平水韵下平十一尤韵。对仗工整,格律也基本准确。

生命的无常境遇。杜甫在《天末怀李白》中说:“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。”在土著文人中,木公的诗歌创作受杜甫影响颇深。杜甫那种“忧国忧民”的博爱精神在木公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体现。木公的这种忧患意识则来自他的身份,木公作为土司首领,在成为诗人之前还是一名统帅和治安官,作

述原因,《焦氏易林》可以纳入鲁学系列,作为鲁学的四言诗加以处理。京房出仕是在汉元帝初期,由此逆推,他向焦延寿学《易》应在武帝晚期。丁宽授田王孙《易》是在景帝、武帝之际,孟喜等人师从田王孙,应在武帝期间,与焦延寿所处时段是吻合的。

西汉孔氏家学的四言诗,主要见于《孔丛子》一书。其中《连丛子》上所载孔臧的《杨柳赋》《鸛赋》《蓼虫赋》,虽然名称是赋,其实是三首四言诗。第一首六十句,五十三句是四言。第二首三十六句,纯用四言。第三首二十四句,二十二句是四言。孔臧是以写诗的方式作赋。

西汉与鲁学相关的四言诗,还涉及刘向的《列女传》《列仙传》。刘向家族世代传习鲁诗,奉宣帝之命,他又研习《谷梁传》,是一位鲁学系统的文人。他所编纂的《列女传》《列仙传》,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是一首四言诗,用来重复前边的叙述或进行评论。这些诗没有从文章中独立出来,但从中可以看出刘向对四言诗情有独钟。

西汉与鲁学相关的四言诗,还涉及刘向的《列女传》《列仙传》。刘向家族世代传习鲁诗,奉宣帝之命,他又研习《谷梁传》,是一位鲁学系统的文人。他所编纂的《列女传》《列仙传》,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是一首四言诗,用来重复前边的叙述或进行评论。这些诗没有从文章中独立出来,但从中可以看出刘向对四言诗情有独钟。

西汉与鲁学相关的四言诗,还涉及刘向的《列女传》《列仙传》。刘向家族世代传习鲁诗,奉宣帝之命,他又研习《谷梁传》,是一位鲁学系统的文人。他所编纂的《列女传》《列仙传》,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是一首四言诗,用来重复前边的叙述或进行评论。这些诗没有从文章中独立出来,但从中可以看出刘向对四言诗情有独钟。

西汉与鲁学相关的四言诗,还涉及刘向的《列女传》《列仙传》。刘向家族世代传习鲁诗,奉宣帝之命,他又研习《谷梁传》,是一位鲁学系统的文人。他所编纂的《列女传》《列仙传》,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是一首四言诗,用来重复前边的叙述或进行评论。这些诗没有从文章中独立出来,但从中可以看出刘向对四言诗情有独钟。

西汉与鲁学相关的四言诗,还涉及刘向的《列女传》《列仙传》。刘向家族世代传习鲁诗,奉宣帝之命,他又研习《谷梁传》,是一位鲁学系统的文人。他所编纂的《列女传》《列仙传》,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是一首四言诗,用来重复前边的叙述或进行评论。这些诗没有从文章中独立出来,但从中可以看出刘向对四言诗情有独钟。

(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中心教授)

为经历过战争的人,自然对民生疾苦有深切体验。张志淳为木公的《雪山始言》作序时说:“间尝问诗,告以始于杜。又问所先?告以近体,可持循以人。无几何,以所为诗数篇至,若有近杜者矣。又无几何,以所为近体二百余篇至,良有似杜者矣。”可见,对唐诗的自觉学习,是土著诗人诗歌创作取得进步的巨大推力。

共同理想的塑造。土著诗人在学习唐诗诗歌技巧的同时,也感受到了唐诗中价值观念和共同理想的份量,在学诗的同时,自觉把这种观念和理想融入骨血。在土著诗人桑映斗的《对雪吟》中有“君不见,少陵穷饿不知愁,广厦千间为尔谋;又不见,香山挟肘思大裘,却想冬日晒杭州”之句。少陵是指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诗中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,香山句则指白居易《醉后狂言,酬赠萧、殷二协律》诗中“我有一大裘君未见,宽广和暖如阳春;此裘非缁亦非纴,裁以法度絮以仁……与君展覆杭州人”之句。诗人也愿像杜甫和白居易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,把民生的疾苦放在心上;也愿意把“天下寒士俱欢颜”作为要实现的共同理想。这些土著诗人,自发自觉地融入民族大义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理想中去,为中华精神的光大续写了新的篇章。

明清云南土著诗人对唐诗的学习是多角度、全方位的,从创作到审美,诗品到人品。他们对唐诗的接受并非生吞活剥、盲目学习,而是在接受中悄悄融入了本民族独特的气质个性与审美取向。因此,他们的诗歌创作既有接受史的共同特征,亦有自身的独特印记。

(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。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[17ZDA262]阶段性成果)

世一种人,其人甚奇,然亦甚可恨,以为禅也,戒行不足;以为儒,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,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,于业不擅一能,于世不堪一务,最天下不要紧人”(《袁宏道集彙校》卷五《徐汉明》)。这样的人生态度,也正是他自命不凡,又放弃了政治教化目的后才有的。

袁中道的性格又异乎其二位兄长,他的“然以豪杰自命,而欲以一世之豪杰为友”,“性喜豪华,不安贫窶,爱念光景,不受寂寞。而沉湎嬉娱,不知撙节,故尝病”(《叙小修诗》),“常携酒人数十辈大醉江上,所到市肆鼎沸”(《袁宏道集彙校》卷十六《寄三弟》),又好游历,足迹几遍天下。这样的性格,在晚明其实不合时宜,所以他34岁才举于乡,48岁才中进士。而他的思想与人生,也经历了年轻时追慕豪杰、杂取道家放浪派和佛家狂禅派的历程。其后期的创作,虽然也写自己的思想情感,但不再有“如水东注,令人夺魄”(《叙小修诗》)的神采,也不再有家豪自命的相关内容。

由公安三袁兄弟不难看到,体质、性格如何影响着文人的入世道路与文学事业。而这种关联性,在钟惺身上表现得似乎更为明显。钟惺家人大多体质较差,24岁时,母亲冯宜人卒,隔21天,弟弟钟惺病,年仅21岁,母及弟弟病时皆有吐血病症。之后的十几年间,其子侄多有夭折者。而钟惺本人也是从小就体弱,青年时代就反复生病。谭元春《退谷先生墓志铭》说:“退谷羸瘦,力不能胜布褐。性深靖如一泓定水,披其帷,如含冰霜。不与世俗人交接,或时对面坐起若不相睹者,仕宦邀贵,无酬酢人,寒暑不辍”,生病了还坚持,致“惫极而卒”(《珂雪斋集》卷十七《石浦先生传》)。所以袁宗道虽然是公安派的一员,也反对七子,好白居易、苏轼,但他对性灵理论论的贡献比较有限,若无宏道,他在文学史上不会很受关注。而“英特”的宏道,“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”,为人也比宗道放浪得多。他爱自由,又自命不凡,在吴县令任上,非常羡慕当地人花天酒地的生活,虽也曾忧国,但很脆弱,对社会的失望程度远胜于其兄,有“管他淳朴与浇漓”(《故言效元体》)的想法。这使他较少有思想包袱,也放弃了传统的文学政教功利主义,而特别强调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,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,不肯下笔”(《袁宏道集彙校》卷四《小修诗》)。在做入上,他也不像其兄,而是欣赏“适

吐纳 体质 性格与文学的

沈金浩

莫非

文学遗产

本报教育部 主办
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协办
本期主编:方铭(北京语言大学教授)
2018年第3期 总第909期